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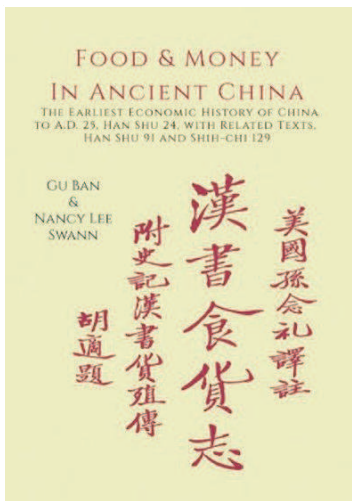
卜居与飘零 ——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下篇)

李若虹

1945年2月10日的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

4

1944到1945年间,胡适在纽约、康桥生活时,他和诸多中国学友、师生来往。从今天来看,当时在美东的中国学者、学生圈子论人数虽然不大,但可谓群英荟萃。胡适和杨联陞日记提及的学者,此后在各个领域都成为领衔人物。1944年秋,在纽约送别胡适前往哈佛任教的友人中就有周鯁生。周鯁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和教务长。从1939年起,他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和胡适一起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鯁生归国后,1945年7月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邀请了许多年轻的学者来到武大任教。胡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去武大讲学,看到武大集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老相识周鯁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还有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也在纽约车站为胡适去波士顿任教送行。刘修业是福州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2年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工作,编制国学、文学等索引。1936年,她赴法与王重民一起抄录敦煌资料,著录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书。1937年4月,在巴黎与王重民结婚后不久去伦敦大学进修。1939年与王重民同赴美国,夫妇俩先后在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编辑目录。胡适提到的一同来送行的“于领事”是当时担任驻纽约总领事的于竣吉(字谦六)。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秘书和哈瓦那总领事等职。另一位“锺兄”指的是刘锺(别号亦锺),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驻英大使馆和驻美大使馆工作过。另一位梁鏊立也



1950年出版的南希·李·斯旺(Nancy Lee Swann, 中文名孙念礼, 1881—1966)译班固《汉书·食货志》,胡适题写书名。此为2013年重印版

麻州康桥加登街(Garden Street)29号。现为哈佛大学的教工和学生公寓



曾担任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和胡适一起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可见送行的友人中,好几位是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跟随他工作过的。

另外当时在康桥餐会、茶聚里频频出现的两位是张晓峰和张福运。他们并不是汉学家,但其实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留学哈佛的中国学者。张晓峰(其昀)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当时他和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一同力聘杨联陞完成博士学位后就到浙大任教。而张福运也在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班后,于1911年来到哈佛大学学习,成为第一位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张福运任教于北京大学,传授国际法。1922至1925年间,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

5

当然还有当时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攻读经济史博士学位的杨联陞。胡适认识了杨联陞,那肯定也会认识杨的导师和恩人贾德纳。当时学社资助不少有志于汉学的美国学生和老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中文,修史料。贾德纳就是其中一位。我曾在另一篇写杨联陞和柯立夫的文章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贾德纳和杨联陞的师生之交。贾德纳1939年底从北京回到康桥后,并没有得到哈佛的终身教职而四处求职,但是他依然安家康桥校园附近。1940年代初,杨联陞一直住在他家,离胡适任教时住的加登街只有一街之隔,步行只需三五分钟。

就胡适1945年前后在康桥熟识的这批中国学生和学者同中外汉学家的交往的细节,参照杨联陞的日记,我们可以重构和回述其中两桩轶事,既风趣,又含学术史意味。

1945年2月10日晚,贾德纳邀请了一批学者来寓所共进晚餐。那天晚间,大雪纷飞,波士

顿2月的一个大冷天。杨联陞在日记里写到:“晚贾德纳请客,有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Robert Pierpont) Blake、Stinge、(Serge) Elisséeff、(James) Ware、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及余。”“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全开也里可温之说。伯(希和)以为蒙语是the powerful之意……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伯不同意)。”他们又“谈及中国工业化问题。大家意见不一。”于是,杨联陞感叹道:“汉学家不必懂经济也!”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师生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导师特别提议这位门生应计划做英法之旅。

对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书评经验谈》中谈到伯希和,不禁想起了贾德纳邀请的这次晚宴。“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课),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

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不过,作为当时中外汉学界举足轻重的两位领衔学者,胡适与伯希和这次在康桥贾府见面并非第一次。早在1926年9月,胡适在大英博物馆查阅敦煌文书后,就曾经去巴黎同伯希和见面,探讨敦煌文书卷子,伯希和以旧作《有关六朝和唐朝几位艺术家的笔记》相赠。而1945年2月这次再聚康桥,实缘于他们和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大学间长期的学术交往。

早在1924年1月,伯希和受邀前往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作了题为《中国考古的新近发现》(“Recent Discover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的演讲。1926年3月,伯希和又来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讲《中国北方的新石器艺术》(“Neolithic Art in Northern China”)。1928年12月,他再次受邀来哈佛讲《新疆寺庙的发掘》(“Unearth Buddhist Temple in Chinese Turkestan”)。可见在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之前,伯希和已经多次就他在中亚的新发现来作演讲,对当时刚刚起步的哈佛汉学有了最初的影响。

1930年代初,胡适婉言谢绝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一职后,学社转而邀请伯希和出任,可是伯希和也回绝了。根据洪业回忆,学社又邀请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同样被拒。学界曾玩笑说,伯希和与戴密微身居1930年代风起云涌的巴黎,怎么愿意来到北美乡间小镇康桥去受罪?还是在伯希和的推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请到了俄裔法籍专攻日本学的学者叶理绥出任,他当时是伯希和在巴黎的一位年轻但颇具前途的同事。

1936年,胡适与伯希和同时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档案馆馆藏校史资料记载,伯希和是“一位坚韧的探险家,对中亚文书和艺术

(下转10版) ➔